



乐人之都

上海

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

榎本泰子著

彭谨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乐 人 上 海 之 都

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

榎本泰子著

彭谨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人之都——上海: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日)榎本泰子著;
彭瑾译. -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3. 10

ISBN 7-80667-277-X

I. 乐… II. ①榎… ②彭… III. 西洋音乐-音乐史-中国-近代
IV. J6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180 号

责任编辑:王亚平

封面设计:陆震伟

乐人之都——上海 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

(日)榎本泰子 著 彭瑾 译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6,000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册

ISBN 7-80667-277-X/J·259 定价: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3250800

作者 简介

1968年生于东京。毕业于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
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在
东京大学担任助教，现任同
志社大学语言文化教育研究
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
较文化、中国近代音乐史。
专著《乐人之都——上海》
(研文出版社，1998年)
获得1999年度三得利学艺
奖、日本比较文学会奖。



榎本泰子

译者
简介

彭瑾 1964年生于上海。毕业于
华东师范大学日语专业，
1990年赴日留学。1993
年获日本大阪教育大学日语
教育学硕士学位。现任华东
师范大学日语系讲师。主要
论文有：《日语初级教材中
“话题”的选择与“场面”
的设置》，《日语中级阅读
的指导方法》等。主要译文
有：林谦三《东亚乐器考》
中文版补遗《弦鸣乐器——
和琴的发展演变过程》，
《享保年代出现的弓擦箏》，
《关于汉式琵琶》等。

序

《乐人之都——上海》是我国第一部以外国学者的视角,客观、真实地记述 20 世纪初期至 30 年代间,西方音乐如何进入中国的史实性近现代音乐史专著。作者以清末民初由宫廷范围的基督教音乐导入为端绪,通过初期的留学热、学堂乐歌的展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等,逐渐将焦点引向当时西洋文化最为集中、音乐活动最为活跃的东方之都——上海。著作集中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各方史料,全面展示了上一世纪 20、30 年代出现在上海的音乐事件(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形成,上海音乐学院的建立等),并大量记叙了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过程中的相关人物(如蔡元培、萧友梅、丁善德、黄自、赵元任等)。

在我国,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曾有过通史类、音乐人物等的著作以及专题性论文的研究,但像《乐人之都——上海》那样,试图以音乐的人物、事件为主线,附以大量一手史料来论述这一时期的音乐史面貌的著作还是第一部。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借助丰富的史料,客观、真实地记录了 20、30 年代上海的音乐状况,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我国接纳外来音乐文化的缩影。

《乐人之都——上海》是榎本泰子女士向东京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著作于 1989 年在日本出版(文研出版社),翌年便获得了日本“三得利”学艺奖。笔者是同作者一起在日本同志

社大学短暂工作时得到赠书的。拜读后深感作者对中国上一世纪 20、30 年代前后的历史有着深入的调查, 占有的资料量也十分丰富翔实, 研究的视角独特, 阐述上力求客观真实, 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近年来有关如何撰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有着较为激烈、尖锐的争论, 史学界屡有“重写音乐史”的口号。因此, 这部著作的出版无疑有助于我们从一些新的视角来理解和认识我国这一时期的音乐历史。

此书的出版能让我们了解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希望这部史实性与可读性兼备的著作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赵维平

2002 年 12 月 25 日

前言

本书阐述的是近代，尤其是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西洋音乐是如何在中国被接受和发展的。

笔者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与本人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从小是在父母放的古典音乐唱片声中长大的，我并不特别地觉得它们是“西洋”的东西。与当时很多女孩一样，我也学弹钢琴、拉小提琴，参加学校的乐队。今日日本音乐文化的繁荣可以说有赖于在与钢琴和吉他等乐器的亲密接触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然而我们现在享受到的音乐若要追本穷源的话，那只不过是明治维新后才从外国引进的。当我们来到海外时，例如音乐家参加国际比赛，一个平时被人忽略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日本人为何要玩西洋音乐。

为了汲取西洋音乐这种外来文化，先人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对此已经有过很多研究。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这种现象并非局限于日本。进入近代以来，亚洲各国都处在接受或被迫接受西洋文化的境地，所以理应有着同样的烦恼，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以前我在研究傅雷（1908～1966）的西洋音乐观时，为他那极其“中国式的”解释而感到惊讶。傅雷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因是著名钢琴家傅聪（1934～）之父而广为人知。他从贝多芬那里发现了儒教的精神，从莫扎特的音乐中听出了老庄

的境界,这种解释在我们日本人看来也许近乎离奇。然而若把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期这一时代脉络与傅雷自身的思想经历结合起来阅读他的文章的话,就会发现不但没有任何的不协调,甚至会觉得其中存在着必然性。这反映出中国在接受西洋音乐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做法。

对傅雷的研究不仅让我重新认识了有关中国如何汲取西洋音乐这一研究主题的意义,而且激发了我对上海文化的兴趣。最令我萦绕心头的是养育了钢琴家傅聪的租界这片土地,还有引人注目的管弦乐队以及外国音乐家的存在。以前我只是从傅雷个人着手考察“中国的西洋音乐”,这里我希望从文化史的角度来作一描述,包括对西洋音乐的汲取的历史。

本书是围绕着 1927 年创立于上海的中国最早的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以及与之有关的音乐家们展开的。其中对创立者萧友梅的记述占去了较多的篇幅。中国对于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就连萧友梅这样的重要人物的传记也是几年前才发行的。由于长期以来对于解放前的音乐文化没有进行系统的考察,因而很多资料至今尚未公开。在日本虽然就当时的音乐家及其作品,在有关音乐史的条目中有过少量的介绍,但至今还没出现过从时代背景及文化意义上进行论述的文章。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进而到动乱的 30 年代,政局动荡的中国究竟是如何接受西洋音乐这种外来文化的呢,这不单是音乐史的问题,也是考察西洋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位置的一个线索。

本书第一章概述西洋音乐的传入以及早期汲取的状况,第二章以后详细论述辛亥革命后的音乐教育机构的动态,并阐明在 30 年代的上海中国与外国人之间的音乐交流,以及中国音

乐家们的创作。

为了反映当时的状况，本书尽量多地收入了有关照片、乐谱、音乐会的节目单等资料。

希望以本书为契机，能有更多的人对这个研究课题产生兴趣。

目录

序	赵维平
前言	(1)
第一章 西洋音乐的传播与普及	(1)
第一节 基督教带来的音乐	(1)
第二节 留学日本热与学堂乐歌	(12)
注	(23)
第二章 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	(31)
第一节 蔡元培的美育思想	(31)
第二节 时代骄子萧友梅	(41)
第三节 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	(60)
注	(85)
第三章 乐人之都——上海	(95)
第一节 租界的音乐文化	(95)
第二节 国立音乐院的诞生	(113)
第三节 关于创作歌曲	(141)
(一) 萧友梅	(143)
(二) 赵元任	(151)
(三) 青主	(159)
(四) 黄自	(166)
注	(175)

第一章 西洋音乐的传播与普及

第一节 基督教带来的音乐

中国人是何时最早听到西洋音乐的呢?

1889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书中,记载有景教(Nestorius 聂斯脱利派)的经文和赞美诗的诗句。由此可见,早在唐代西洋音乐的旋律就通过基督教赞美诗的形式传入了中国。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任何乐谱,因而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演唱的,不过这些赞美诗的诗句大多整齐地译成了七言八句的形式^①。

元代基督教曾传播一时,但信徒们咏唱赞美诗的现象只限于一小部分信徒之间。到了明代,以布教为目的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1601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第二次进京,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次机会,给万历皇帝献上了来自西方的珍品。皇帝对大小不一的一对台钟颇有兴趣,命太监学习台钟的用法。当时呈上的礼品中还有一件乐器。在《续文献通考》中,称这种乐器为“西琴”,就其形状来看,像是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的一种^②。皇帝命令几个太监

学习这种琴的奏法。其中一个年轻的太监悟性很高,令教他们的传教士非常高兴^③。于是,利玛窦受太监们的委托把若干赞美诗的歌词翻译成中文,并撰写了《西琴曲意》一书。这是本流传至今的最早把天主教赞美诗的诗句译成中文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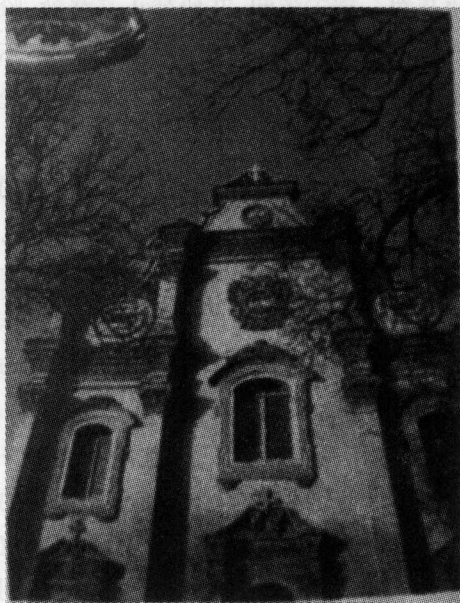


徐文定公(光启)与利玛窦谈道图

众所周知,传教士带来的天文、数学、历法、地理等知识,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音乐领域也给了中国不少刺激。清朝皇帝中就有酷爱西洋音乐的。1673年,葡萄牙的传教士

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45 ~ 1708)来到了北京,有一次他把只听了一次的一首中国歌曲准确地用乐谱记录下来,并用击弦古钢琴原样弹奏给康熙皇帝听,令康熙大为惊叹。康熙本来就喜欢音乐且擅长演奏乐器,于是就跟着徐日升学习击弦古钢琴的弹法^④。后来奉康熙敕命编撰的《律吕正义》一书,可谓集中国音律之大成。其续编介绍了五线谱等西洋音乐知识,这些内容都是以徐日升以及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 1670 ~ 1764)带来的音乐书籍为基础编撰而成的^⑤。

让我们再回到历史,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据说北京的传教士们用风琴及其他乐器奏起了葬礼乐。利玛窦把乐器作为贡品



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天主教南堂)

带到中国以前,为了做弥撒,传教士们也已带来了某些乐器^⑥,但是这些乐器只是在他们中间使用,或在宫廷演奏,好像并未传入中国普通百姓之中。

在北京的中国人最初接触到的西洋乐器,可能就是建于1652年的北京最早的天主堂内的管风琴吧。据说顺治年间,北京城内宣武门附近建造了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教堂的两个塔上分别装有管风琴和钟^⑦。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一定是十分奇特的建筑。有位传教士曾写道,“一天中,几乎随时都有异教徒进入教堂”^⑧。在北京除了这座位于宣武门内的被称为“南堂”的天主教堂以外,还有北堂、东堂和西堂三座教堂,可以想象这些教堂都备有管风琴。但这些管风琴只供少数信徒使用,还不能说是西洋音乐普及的开端。雍正年间,开始禁止基督教,除了那些在宫中制定历法的传教士尚能留下来以外,其他人都不能在中国布教。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道光皇帝下达解禁的上谕为止。

鸦片战争的失败,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同时也导致了西洋文化的迅速流入。对此传教士充当了主要角色。1842年缔结的《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割让香港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之后清政府又相继与美国、法国签订了同样的条约。英国当时采取的是政、教分离的政策,而法国却与之相反,一开始就积极地传布基督教。根据1845年签订的《黄埔条约》,清政府承认在法人开埠地附近,拥有开办教会、医院、学校的权利,由此法国迈出了宗教活动受保护的第一步。美国在前一年签定的《望厦条约》中已得到了同样的权利。当初的这些条款只是为了保证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的权利,但逐渐扩大到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布教活动上。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时缔结的《天津条约》中,清政府正式允许基督教布教自由。

在上海的英租界,1847年就已经有了圣三一教堂,而现存最古老的教堂则是建于旧城东门外的1853年竣工的董家渡天主教堂^⑨。这些教堂不仅是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举行崇拜仪式的地方,也是在中国扩大基督教影响的重要据点。他们在港口附近相继建造了大大小小的教堂,教会附设的学校广招中国人子弟入学。

起初布教活动进展得并不顺利,这与中国方面的排外主义有关^⑩。在士大夫们看来,所谓学问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参加科举,很少有人对西洋的学问产生兴趣。出入于教会及其学校的往往是那些企求免费食品和衣物等的穷人,根本谈不上什么宗教信仰,与教会方面所期待的培养布教人材的目标相去甚远。

但是,到了19世纪末,教会学校的数量急剧增加,招募了许多中国学生。这是由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海关、邮局主要控制在欧洲各国手中,他们需要工作人员,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内部洋务派抬头,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之下,打着英语教育的幌子,收取高额学费的学校也开始出现。以往的学校主要以初等教育为主,如今实施中等教育的学校,乃至大学也开办起来了。据说当时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约有两千所,学生计四万人以上^⑪。天主教会办的多为私塾式的初等学校,而热心教育的新教教派大多数创办中等教育。

在那个时代,清朝政府对普通百姓的教育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教会学校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些学校开设读写、算术、地理、历史等课程,此外在宗教教育方面当然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弥撒、礼拜以及集会活动,并和着管风琴学唱赞美诗。有的女子学校一开始就把音乐作为主要